

明代重要经济文献《万历会计录》

徐 蜀

会计录是记载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的专书，唐代有《平赋书》、《国计录》，性质与此相同。会计录作为书名，始于宋代，《宋史·艺文志》收有反映田赋情况的《皇祐会计录》六卷、《庆历会计录》二卷。《万历会计录》是现存历代会计录中最完整的一部，对于研究明代的社会经济史及明代中后期的田赋制度改革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代中叶以后，国力日趋衰颓。例如明初登记的税田额为八百五十万顷，到弘治十五年，降至四百二十万顷，减少了整整一半，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田赋收入。到嘉靖时，“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每年田赋收入约二百万两，而支出“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明史·食货志》）。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便力图恢复政府控制的税田额，压缩开支。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对田亩、户数、税额以及各项费用作一番清理，并制订出新的章程。《万历会计录》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万历会计录》的编撰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万历元年至四年，主其事者为户部尚书王国光。王国光字汝观，阳城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吴江知县，隆庆时官户部尚书，后被劾乞罢。隆庆四年起刑部左侍郎，拜南京刑部尚书。未几，改户部，总督仓场，万历初续理户部事。史载，“国光有才智，初掌邦计，多所建白”（《明史·王国光传》）。他反对用“裁邮站，搜赎金，增盐榷”，“遣宪臣分部

检括外藏”，来弥补亏空的作法，而主张“生财之道，取诸什壹而已，什壹不亏则帑庾充，常用足”。他认为，只要认真清理各地户籍、田额、岁征，恢复国家应收的赋税，再节约开支，即可消除财政危机。因此，他下决心编撰一部详细汇集财政收支状况的会计录。他在《万历会计录·进书表》中说道：“国家命脉在是，因循不整，弊将何极？因考前代，唐有平赋书、国计录，宋有会计录，逮祥符、皇祐、治平之间复辑之。我朝《会典》、《一统志》虽载有户事，然采摭大概而已，惜未有专书。辄不自量，会同侍郎李幼滋属各司诸郎，遍阅案牒，编辑愈年，而都给事中光懋复议旧典，刊定章程，进呈赐名，以垂永利。”

万历四年二月，《万历会计录》编撰基本就绪，而王国光“抱病蒙恩赐归”。临行前，他曾请求将书稿缮写纂刻，但因明神宗下令“再加订证”而未果。其原因大概是王国光所撰之《会计录》，虽对过去及当时的户籍、田额、赋税、支出费用等作了考察，但由于豪强去籍、隐匿额田、逃漏赋税的根本性问题未加解决，所以无补于事。由于同样原因，《万历会计录》的修订工作也停顿下来。

第二阶段，从万历七、八年间至九年四月，主其事者为户部尚书张学颜。张学颜字子愚，肥乡人，登嘉靖三十二年进士，由曲沃知县入为工科给事中，万历六年拜户部尚书。当时，张居正力行改革，并取得了成效。《明史·张学颜传》称：“时张居正当国，以学颜精心计，深倚任之。学颜撰《会计录》以勾稽出纳。又奏列清丈条例，厘两京、山东、陕西勋戚庄田，清溢额、脱漏、诡借诸弊。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牧湖陂八十余万顷。民困赔累者，以其赋抵之。自正、嘉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学颜有力焉”。《明史·食货志》说：“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经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耗。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

百万顷。”张学颜在《万历会计录·进书表》中也说：“臣等通行天下清丈田粮，革豪右隐占，苏小户包赔，故吏皆奉法，民不加赋，正供所输，太仓有玖年之积。”可见，当时国家控制的额田、^①户籍、赋税基本上得到恢复，收入与开支相较，已有盈余。

“朝廷欲复旧制，计臣欲考旧额”（《进书表》）的目的已经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制订章程并刊布施行，就势在必行了。因此，张学颜于万历九年四月将书稿进呈后，明神宗立即批示“依拟刊行”。次年二月，即印刷装订出二部，供皇帝阅览及史馆采录。其后又陆续印刷，颁行省直边镇。

《万历会计录》共四十三卷（现存四十二卷），约一百万字。其书资料的搜集、考订及叙述方法，据王国光《进书表》所云，乃“先考本部册籍，未的者，移查边腹及求耆旧诸臣家藏，参互考订。旧额新增，备述端委，类分款列，悉明数目。”张学颜接续其事，复行参校，则“首遵《大明会典》，次考《历年条例》，次查本部册籍，补其缺遗，厘其讹误”，“分理则以司冠郡，以郡冠县；分款则以总冠撤，以撤合总”（《进书表》）。

此书记述年代虽不长，但范围广泛，史料翔实，几乎概括了当时财政收支中的一切帐目。这从全书的目次中即可略见一斑。《万历会计录》所述内容依次为：全国田粮总额、岁入岁出、十五省直田赋、边镇饷额、内库供应、光禄寺供应、宗藩禄粮、本部职官、文武官俸禄、漕运、仓场、营卫俸粮、屯田、盐法、茶法、钱法、钞关船料商税、杂课。像《万历会计录》这样全面、集中、精确地记载财政收支的书籍，在古代文献中是不多见的。

此书在记载田亩、户籍、赋税等情况时，用对比的方法，罗列洪武年间（开国之初）、弘治年间（财政严重危机时期）与万历六年（改革之后）的数字。其目的是通过数字比较来突出张居正改革的成就。如卷一记载全国田亩、人口、赋税数字，并于弘治之后注明比洪武原额减少若干，于万历六年之下注明比弘治

年间增长若干。

此书每卷末都附有按语，多为切中时弊之言，代表了以张居正为首的改革派的思想。如卷一按语谓：“国家疆域尽四海，田赋户口逾于前代，载在《会典》者可考也。今额视先朝增者少减者多，何哉？田没于兼并，赋诡于飞隐，户脱于投徙，承平既久，奸伪日滋，其势然也。顷荷明旨，清丈田粮，原额可冀渐复。……怀已安已治之虑，清冗费冗食之源，去浮从约，以复祖制，臣等深于朝廷有至望焉。”

《万历会计录》为万历十年刻本，国内仅存一部，藏于北京图书馆。此本版框高23厘米，宽16厘米。每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四周双边。为满足学术界的需要，书目文献出版社已将其辑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出版。

作者工作单位：书目文献出版社

“小旋风柴进里人”为孙楷第之别署

《文献》杂志1989年第2期载黄秀娴《鲜为人知的〈凤凰台〉传奇》一文，说《凤凰台》抄本卷端钤有“小旋风柴进里人”印记（篆刻），但未说为何许人？顷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世德先生6月10日来信云：“据我所知，孙楷第先生别署‘小旋风柴进里人’。他有长方形、篆文‘小旋风柴进里人’印记。他于1957年赠我的诗笺上，他于1960年赠我的《元曲家考略》一书上，均钤有此印。他的一些藏书，曾于下乡参加干校前被迫出售给中国书店。可知《凤凰台》抄本确系他的藏书。”

• 编者 •

萬曆會計錄卷之一

天下各項錢糧原額見額歲入歲出總數

原額

洪武年間諸司職數

田土官民共捌百伍拾萬柒千陸百貳拾叁頃

陸拾捌畝零

夏稅米麥共肆百柒拾壹萬貳千玖百石○錢

鈔共叁萬玖千捌百錠○絹共貳拾捌萬捌

千肆百捌拾柒疋

秋糧米共貳千肆百柒拾貳萬玖千肆百伍拾

石○錢鈔共伍千柒百叁拾錠○絹伍拾貳

疋

人戶共壹千陸拾伍萬貳千捌百柒拾戶人口

陸千伍拾肆萬伍千捌百壹拾貳口

弘治年間諸司職數

田土官民共陸萬貳拾貳萬捌千伍拾捌頃捌

拾壹畝零比洪武原額減貳百貳拾柒萬

夏稅米麥共肆百陸拾貳萬伍千伍百玖拾肆

石叁斗捌升貳合柒勺比洪武原額減捌萬

壹升比洪武原額減貳萬

麥菽貳百伍拾伍石肆斗伍升伍